

G20 应关注全球经济新框架 G3

■ 鞠建东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
■ 余心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

刚刚闭幕的杭州 G20 峰会上提出“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如何真正实现“让 G20 成为行动队而非清谈馆”?笔者认为,这毋庸置疑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在失序、迷茫中的又一次努力,向更具代表性、更加高效的新框架的又一次艰辛探索。

回望历史,二次大战之后的全球治理的历程可以由“从 G2 到 G1”来总结。二次大战后,美、英、法、苏等战胜国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政治、安全治理机构;然而,主要大国的短暂合作迅速演变成 G2;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对抗。由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主导于 1944 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于 1949 年成立了包括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 6 个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来阿尔巴尼亚、东德、古巴、越南陆续加入。中国在 50 年代作为观察国参加经互会,于 1961 年中苏对抗之后退出。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之后,G2 的两极对抗演变成 G1:由美国领导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体系。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时美国 GDP 占全球 GDP 的一半以上。以“美元挂钩黄金,其他国家挂钩美元”为特征的西方国家货币体系在 1971 年终结,随后的石油危机催生了美、英、法、德、日、意、加的 G7。1975 年之后的 30 余年 G7 成为西方以至全球经济与金融政策的重要协调机制,诸如第一、二、三次石油危机中西方国家的政策协调,广场协议解决日美经济摩擦等。尤其是 1991 年末苏联解体之后到 2008 年的 16 年间,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协调全球金融政策,WTO 协调全球贸易政策。虽然有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总体上风调雨顺,由美国所主导的一超多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看上去运转良好。

1976 年 G7 占全球 GDP 的 59.5%,2015 年降为 46%。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近三十年间已快速崛起为 G7 之外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贸易角度来看,缺少了中国的 G7 在全球经济中的代表性已明显不足。G7 框架下“一超多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已不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一声惊雷,造成全球货币金融市场激烈动荡,也宣告 G1—G7 体系走向终结。澳大利亚、法国等 G7 国家领

导人力主邀请中国等新兴大国加入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 年 11 月 15 日 G20 峰会首次举办,开启了后 G1—G7 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探索。相对于 G7,G20 更具代表性,2015 年成员国占全球 GDP 的 85.9%。G20 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域分布也更加均衡。但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代表性增加的同时是效率的下降。G20 成员国在发展水平、方式上的巨大差别使得各成员国的利益矛盾重重。G20 采取寻求共识和协商一致的运作原则,当成员国在重大议题出现分歧时,G20 峰会更多的是领导人之间对共识的探讨,对各自诉求的理解,但缺乏对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经济金融活动的实质性治理。

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例,从第一次峰会开始,G20 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第二次峰会欧盟、俄罗斯、中国等交替发声,再一次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终结美元独霸时代;第五次首尔峰会继续讨论这个议题,关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呼吁各国防止竞争性货币贬值。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回答是“美联储是独立机构,不听白宫指挥”。类似的,作为全球贸易协调机构的 WTO 在 2001 年卡达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各成员国无法达成一致于 2006 年暂停,2007 恢复谈判,2008 年基于印度、中国与美国在“特别防卫机制”的歧见,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宣告破局。

从贸易网络可发现,全球贸易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在 2014 年,亚太各国(地区)大部分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大多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虽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与此“三足鼎立”的贸易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在 1993 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洲 15 国也在 1993 年成立了欧盟(EU),在 2015 年欧盟已经有 27 个成员国。亚洲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但在经济治理体系上仍处于各类双边、多边 FTA 交错并行的秩序探索阶段。碎片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突出,已成为各经济体深度融入区域内价值链协作的关键性阻碍。对于东亚各经济体而言,如何打破这一阻碍、实现东亚价值链的高效运作,进而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下,与欧美

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 G1,也不是美中对抗的 G2,与全球鼎足三立相适应的 G3,才是全球经济新框架未来。



发达国家展开平等对话、共商规则、共享利益,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回看 NAFTA 及欧盟的经验,不难发现,深度的 FTA 合作均存在一个明显的核心国家(美国和德国),在区域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发挥中枢作用,其余经济体则以“辐条”形式,与这一核心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互惠共赢、齐谋发展。这一经验从目前看是成功的,有值得借鉴之处。基于这个经验,东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引导各方在深入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共赢是建立东亚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

东亚经济治理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反映东亚大国——中国和日本——对东亚地区经贸主导权的争夺。1984 年日本贸易总量是中国的 5.7 倍,是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015 年中国贸易总量是日本的 3.1 倍,成为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复杂的东亚地区政治关系,中日政治互信的脆弱,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约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东亚经济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式微。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

东亚国家政治制度上有很大差别,无法像 NAFTA 和欧盟那样要求成员国具有相同的政治体制,我们转而要求成员国有较为一致的文化认同和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纽带是搭建贸易合作伙伴和经济共同体的桥梁,也是维系公同利益、保证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石。更进一步,我们认为以华夏文化为纽带,基于现有的经贸联系构建“华夏共同体”,迈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杭州 G20:阻止全球化逆转

■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不对,应该是说金融危机连锁店,从美国到欧洲到新兴市场甚至整个货币体系。从宏观资产负债表视角来看,美国的危机源于过高的居民部门的杠杆和债务,欧债危机则源于过高的政府部门杠杆以及债务,新兴市场危机则源于过高的对外部门的杠杆和债务,最终的货币体系危机则源于杠杆可以无限高的货币部门,即信用货币体系下的中央银行,货币体系危机意味着汇率的巨幅震荡、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和恶性通货膨胀。而这种杠杆累积和资本流动的模式正是美式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 3.0 的精华部分。

不少研究者喜欢把 2008 年以来的这轮危机跟 1929~1933 年大危机做一个比较。伯南克等货币主义者认为当时投放的货币不够,要尽早尽可能多的投放;克鲁格曼等凯恩斯主义者则建议做更大规模的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现在看来这些建议都还有点管杀不管埋,管放不管收的任由我之后洪水滔天的味道。但无论如何 1929 年危机以后,世界再也没有回到它原定的轨道,而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以邻为壑、民粹崛起以及全面的战争。我们的观点是——全球化正在逆转,或者确切地说,全球化 3.0 正在逆转。

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问题。而微妙的是,相应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不仅会使得全球经济略显平衡,但也可能会使得全球经济回归平庸。确实,上一轮的高速繁荣是真实的,但很可能是一次性的。形成经济“大稳健”状态的可能不是那些所谓货币政策大师如格林斯潘之类的高超技艺,而是在亚洲沿海血汗工厂里默默辛勤劳作的农民工们。为什么现在看不到通货膨胀还有了名义负利率,因为核心通胀被全球制造业的产能

过剩所压制。其实全球化的繁荣就是发达经济体居民和政府加杠杆扩张需求的过程,是新兴市场获得外来资本加产能完成原始积累和经济追赶的过程,这伴随着货币部门的流动性的洪水泛滥,这个过程一度十分甜蜜,现在一旦再平衡和结构调整,就体现在全球化倒退和去杠杆过程的危机连锁以及以邻为壑的民粹崛起上。

全球化当然有它的阴暗面,它有可能正在日益变为一个零和博弈,毫无疑问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并非没有付出高昂的代价)。从全球的财富分布来看,中国的中产或者说劳工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国的有产阶层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还有谁是受益者?资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少部分科技新贵和掌握核心资产的大资本,它们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积累。它的快速积累导致的最后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剩,形成负利率和资产荒,负利率就是消灭过剩的资本。在一端是负利率,流动性过剩和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而在另一端,就是低端消费不足。需求不是需要,需求必须得到购买力的支持,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和低端需求的全面减少,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利润下滑无法提供充分的投资回报,从而造成无利可投的所谓资产荒。在古典环境下,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是通过牛倒入河流的去产能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去杠杆来实现的,而眼下一波又一波的 QE 正在阻止最终出清的实现。因此,负利率和产能过剩可能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式的停滞、僵尸化和资产负债表衰退都是大概率选项,而天文量级的放水之后的最后总归会一指向货币体系和全球化,时钟正在嘀嗒嘀嗒作响,负利率正是天启骑士团中的一员,其他的几位可

国际经验表明,生产、贸易依存度,距离,文化相似性,政治关系是确定自贸区成员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在亚洲地区 26 个经济体中,首先选择对中国生产、贸易依存度最高的经济体,然后选择距离相近的经济体。我们从节日、民族、宗教、语言、历史渊源这 5 个角度入手,分析每个国家与华夏文化联系的密切程度。最后,我们再考虑这些经济体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综合以上各个因素,我们筛选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蒙古、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 9 个经济体组建“华夏共同体”。

在这 9 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澳门在 2003 年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又于在 2015 年进一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 CEPA 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门 CEPA 服务贸易协议》。大陆与港澳的服务业基本上实现贸易自由。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与中国大陆在 2010 年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中国和新加坡于 2008 年签署了双方自由贸易协定,2015 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蒙古对中国贸易依存度 2014 年达到 62.1%,是所有国家中对中国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也是朝鲜的第一大贸易国,从 2010 年到 2013 年的三年间两国贸易量翻了一倍。中国同样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国,2014 年越南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达到 19.7%。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在没有世界政府下对全球经济的管理”,因而有赖于各国主权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社会群体乃至个人在共识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合作。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取决于以下 4 点要素:

第一,代表性。2015 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共同体 GDP 分别占全球 GDP 的 16.4%、32.2%、22.6%。三个地区的 GDP 总和占全球的 71.2%。与此同时,三个地区分别代表了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结构。

第二,效率: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和参加谈判的人数成反比。人数越多,利益差别就越大,达成共识的可能也就越小。二战后的 G2 有效是因为美苏主导,G1—G7 有效是因为美国主导。当前的 G20,只能是一种过渡。只有在 G20 当中诞生核心国家,G20 才会成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在 NAFTA 是核心国家,德国在欧盟是核心国家,而中国在华夏共同体是核心国家。如果由

美、德、中首先在 NAFTA、欧盟、华夏共同体就相关议题获得各个自贸区成员国的一致意见;再由美、德、中代表三个自贸区就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继而由三个自贸区的成员国家在 G20、WTO、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相关议题,在全球推动并执行相关政策。这种以美、德、中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足鼎立的“G3 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很可能将开创一个稳定而高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三,推动合作而不对抗。美苏争霸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只要把对手打掉,剩下的一强就成为全球的霸主,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得 G2 体系通常不稳定。现在常常提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似乎美国是发达国家的核心,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而世界大局似乎进入了美、中争霸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类似,有相似的诉求;另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上,中国,常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反而和发达国家更为接近。比如说,中国的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只有 4% 左右,大大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 15%,而和发达国家接近。在环境政策上,中国现在也倾向于严格的环境保护,在政策上和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更为接近。而欧洲的德、法,在反对美元霸权,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上,和中国,而不是美国立场更加接近。亚投行成立时,英国是西方第一个加入的国家。欧洲大陆,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法律体系都和英、美体系有明显差别。美、德、中的 G3,相对于所谓的伙伴关系(G2,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加稳定,更趋于合作,而不是对抗。

第四,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世界进入了以创新驱动,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时代。多元的文化是创新的土壤,不同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推动世界的良性发展。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试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恢复美国在 G1—G7 体系下的全球主导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 G3 体系鼓励竞争,鼓励多元化。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全球鼎足三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 G3 体系,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 G1,也不是美中对抗的 G2,才是万象更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的未来。

能也正在陆续赶来(例如川普等)。伴随着中国在全球化 3.0 中获得的诸多红利和初步财富积累的,也同时存在着的三大困惑——首先在贸易方面,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在汇率和货币方面,人民币对外持续升值(尤其 2005 到 811 汇改之前),对内持续贬值(温和通货膨胀和明显资产泡沫);最后在全球投资方面,中国想买的往往买不到,而买到的大多数都赔钱。这其实就是全球金融贸易投资治理体制的旧秩序使然。

全球化 1.0 之前,操作系统很多,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哈里发、天下朝贡、印度和印第安等都是自成一家。但到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 2.0 时,就一股独大了,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一统天下。其他系统要么被彻底删除(美洲),要么被殖民被格式化,也即西方式现代化。其他文明系统被迫都在寻找现代性,其越不成功者(按西方标准)可能就越动荡不安。但其实就算是风靡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老系统也都满身 bugs,全球危机和世界战争的不断到来就是其证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的欧盟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升级思路,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以进行经济、货币和外交一体化试验,但现在却是貌合神离困难重重,甚至在明年的某个时刻,可能会出现最后崩溃的征兆——2017 年欧洲大型经济体,荷德法进入大选周期,诸多右翼政治势力正在展现“去欧洲化”的意愿。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变化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打补丁”,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软件内核并无变化,经历时间或长或短,必然会经历全面的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例如,全球化 1.5 版本中虽然同时存在东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下转 04 版)